

《全球智库报告》解析及评价

胡 薇 吴 田 王彦超

摘 要：自《全球智库报告》推出以来，国内外社会各界对其评价褒贬不一，我国智库界对此报告的认知与态度也经历了从不甚了了到极力追捧，再到趋于理性的转变。通过对《全球智库报告》十年数据的汇总与分析，可以更加清晰地剖析其结构和特点，呈现其背后的价值语境与预设立场，发现其方法与内容缺陷。可以说，《全球智库报告》的科学性和客观性远非无懈可击，甚至与通常意义上的学术标准也有相当的距离，其关于中国智库的排名不仅不适合作为我国智库建设与评价的参照标准，而且具有相当的误导性。反过来，在国内智库领域关于《全球智库报告》存在的一些模糊认识也提醒我们，基于自身国情和发展目标，建立具有公信力的国内智库评价体系的重要性。在将“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确定为国家战略，国内智库的发展迎来最佳战略机遇期的时候，我们要以《全球智库报告》为鉴，在智库研究乃至更为广泛的学术研究和建设中，以更加自信和冷静的态度来面对国外的评价与意见，进而追求和实现更加公正和有效的国际学术话语交流。

关键词：《全球智库报告》 智库评价 智库建设 国际话语权

作者胡薇，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副研究员；吴田，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王彦超，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研究人员（北京 100732）。

习近平总书记 2013 年 4 月“关于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批示被视为国内新型智库建设顶层设计的开端；2013 年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确定为国家战略。自此，国内智库的发展迎来了最佳战略机遇期，智库研究和建设工作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2015 年 1 月 20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后文简称《意见》）更是为相关研究和实践提供了支撑，与之相伴，智库研究与智库评价也进一步升温，掀起热潮。

智库评价从一个新的角度开辟了智库建设和发展的天地，有利于智库从业者和研究者从更为宏观的视角审视全球智库的发展现状与趋势，同步掌握所关注的智库机构在全球或不同区域及领域内的排位。在国内智库评价方面，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于 2014 年初率先发布了《2013 年中国智库报告：影响力排名与政策建议》；在全球智库评价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时为“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于 2015 年 11 月 10 日发布了《全球智库评价报告（2015）》，这两份报告分别针对中国智库和全球智库开展评价与研究，作为由中国

研究机构推出的国内首份智库评价成果，昭示着我国的智库研究和评价工作与新型智库建设工作同步开启。

不同于中国“边做边评”的智库发展路径，欧美等西方国家的智库研究与智库评价工作，不论是产生基础还是发展环境，都是在智库体系相对趋于成熟和稳定之后才产生的。目前，国外具有较强代表性和社会影响的智库评价成果当属由宾夕法尼亚大学劳德学院国际学研究方向的高级讲师、TTCSP 项目主任、宾夕法尼亚大学菲尔斯政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詹姆斯·麦甘^①（James McGann，后文简称“麦甘”）博士主持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市民社会项目”（Think Tanks and Civil Societies Program）课题组（后文简称“课题组”）编写的《全球智库报告》，^②它对全球智库的发展情况做出评价与排名。麦甘于 2009 年 1 月首度以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市民社会项目”课题组名义在官方网站正式发布《2008 年全球智库报告》，^③此后每年发布一次，截至 2018 年 1 月 30 日发布的《2017 年全球智库报告》，已历经十年。自麦甘推出《全球智库报告》以来，国内外社会各界对其的评价褒贬不一，我国智库界对此报告的认知与态度也经历了从不甚了了到极力追捧，再到趋于理性的转变。

总体而言，智库评价与智库发展相辅相成，评估评价是智库发展的指挥棒，科学、公正、客观的评价对于智库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能够起到重要的引导作用；反之，不准确甚至虚假的智库评价则可能不仅对于智库行业，而且还会对更为广泛的政策研究造成误导。由此，本文旨在通过对《全球智库报告》十年数据的汇总与分析，深度剖析该报告自身的结构和特点，以及其影响力的变化和发展，进而针对应当如何辩证地解读《全球智库报告》及智库评价展开分析和讨论。

一、《全球智库报告》的内容与结构特征

美国智库发展的高峰期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至 20 世纪 80 年代，而美国智库研究的高潮期则相应地后推，出现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间，但进入 21 世纪后，美国乃至欧洲主要国家的智库增长和智库研究的热潮都出现回落的趋势。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麦甘领导的课题组推出了以全球智库为对象的评价和排名报告，针对全球智库的大致数量、分布情况、发展趋势等进行了梳理，并在其第一份正式报告中明确指出，全球智库数量虽不断增长，但增速却呈现出显著放缓的趋势。^④随后，每年的《全球智库报告》都会关注一个与智库相关的热点话题——或者是事件性的，或者是趋势性的。与此同时，每年的榜单设计也会随着其关注点的变化而相应变化。这些话题、领域乃至相应的观点都试图引领全球智库的发展，为智库研究者和实践者所用（参见表 1）。

依据其官方网站信息，麦甘自 2006 年起开始致力于全球智库的研究和评价排名，旨在探索

① 参见 <https://www.gotothinktank.com/meet-the-director/>，2018 年 2 月 22 日。

② James G. McGann,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Index Report* (1st-11th edition), Philadelphia: Think Tanks and Civil Societies Program,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2008-2018.

③ TTCSP 官方网站公开的报告是从 2008 年（2009 年 1 月出版）到 2017 年（2018 年 1 月发布）的报告，根据 2008 年报告的相关内容可知，2007 年曾有过试点报告。参见 <https://www.gotothinktank.com/global-goto-think-tank-index>，2018 年 2 月 22 日。

④ James G. McGann, *2008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Index Report*, Philadelphia: Think Tanks and Civil Societies Program,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January 2009, pp. 10-12.

世界主要智库的运营特征和发展现状，2007 年完成了一份试点性报告，以此为基础加以完善，于 2009 年 1 月开始正式发布其全球智库研究年度报告。在 2009 年至 2018 年的这十年间，《全球智库报告》的主题和评价领域不断调整（具体内容参见表 1）。

表 1 《全球智库报告》各年度主题与评价领域的汇总

年份	报告主题	智库评价领域设项
2008	智库数量持续增长但增速放缓的现象及原因	以国际发展、健康、安全、传媒、经济和社会政策等传统领域为主
2009	智库的全球化趋势和全球网络的构建及影响	增设了对科学技术领域智库的评价
2010	延续 2009 年主题	增设了对智库透明度和管理能力的评价
2011	关注 G20（G7 国家除外）和金砖五国等新兴经济体的智库发展，突显其在全球影响力的逐渐上升	增设了对社交媒体、新媒体影响公民活动的关注，增设了对智库经费预算和运营能力的评价
2012	总结全球智库和公共政策的 12 条发展趋势，以及全球智库面临的 12 项新挑战	增设了对普遍关注度较低的环境、教育、社会服务等领域智库的评价
2013	延续 2012 年的主题，此外，开始更多地关注不发达地区的智库发展	细分智库成果，特别对智库举办会议、开展跨学科科研项目等加以评价；将“安全与国际事务”拆分为“国防安全”和“外交政策与国际事务”两个设项
2014	进一步完善 2012 年的总结，扩充为 14 条发展趋势和 16 项挑战	将“健康政策领域”细分为“全球健康政策”与“国内健康政策”两个设项
2015	关注“创新”这一主题，尤其是美、英、德、印度、波兰等国家的代表性智库	增设了对智库的独立性、质量保证、完整策略及运营程序的评价
2016	关注英国脱欧、特朗普竞选获胜等时政热点话题	无特别增设
2017	关注全球粮食及水资源危机，以及非洲智库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增设对“粮食安全”和“粮食和水安全”两个领域智库的评价

数据来源：根据《全球智库报告》（2008—2017）进行汇总整理。

麦甘的《全球智库报告》具有结构化的特点，即从 2008 年首份报告发布至今，每年报告的框架构成基本一致，只在内容上有各种形式的变化。^① 首先以简介开篇，其中包括对智库的界定、分类、分地区的智库情况概要、当年关注的全球性趋势或热点话题；^② 接下来的几部分依次是报告的修改和完善，报告的形成程序和步骤，^③ 大事记，提名和排名标准，智库影响力评估框架，当年的全球智库数量统计，当年的全球智库区域分布，以及各智库榜单。这样的结构化内容组织方式便于对智库进行不同年份间的横向对比，但相应的缺陷是，每年的报告除在第一部分中对一些智库发展的趋势性话题进行概括性阐述外，其他再无新意可言。

结合麦甘的研究背景来看，其在智库排名及对全球智库格局的把握中，针对欧美智库的部分，尤其是对美国智库的探讨值得认可与肯定。^④ 连续十年的报告，不仅反映出美国智库对国家

① 《2008 年全球智库报告》的构成比较简单，自《2009 年全球智库报告》起基本框架如文中总结。
② 在当年关注的全球趋势和热点话题中，麦甘除了整段的文字表述，分别在 2015 年和 2017 年根据当年热点进行过模式创新。例如，2015 年使用案例分析的方式，分析了英、美、德、印度、波兰等国家的相关智库在创新方面的问题；2017 年围绕当年的热点问题“水和粮食危机”汇总编制了相关的全球智库列表。
③ 例如，在报告形成的步骤方面，麦甘仅在 2010 年和 2011 年报告中使用了流程图加以描述，其他年份均使用文字加以叙述。
④ 王继承：《麦甘“全球智库报告”排名机制及其影响（下）》，《中国经济时报》2012 年 9 月 4 日，第 5 版。

政策的影响领域和影响程度，也反映出了美国智库在数量、地区分布、研究领域等各方面动态的发展变化情况。虽然《全球智库报告》仍存在一些争议，但其设计出的四大类评价指标——资源指标、效用指标、输出指标和影响力指标^①——已被当下许多智库评价机构引用作为参考的标准和研究的基础。

二、《全球智库报告》背后的价值语境与预设立场

基于麦甘《全球智库报告》项目的工作方式与内容变化，我们判断其研究主要有两方面的动因。

第一，为了提升自身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这一方面是为了提升其在智库研究领域的学术话语权和影响力，另一方面是为了提升其在智库实践领域的全球话语权和影响力。

正如前文所述，在智库研究领域，美国的智库研究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不断深入，且成果丰富。作为智库学者，如若想在相关学术领域占据一席之地，便需要找到合适的研究切入点。发展到 20 世纪末，学术界对智库的研究主要有两方面的趋势和特点：一是将智库作为政策行为者之一，研究其在政策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②二是基于历史路径的分析方法，研究智库的兴起、发展阶段、不同时期的代表性智库的特点和类型等。^③

在这样的背景下，麦甘就以上两方面都进行了积极的尝试，于 1995 年发表著作《公共政策研究产业中经费、学者和影响力的竞争》，以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美国 7 家智库的基本数据，就智库的概念界定、形成原因、主要运营战略和模式、影响智库投入和产出的主要因素等进行了分析。^④其后推出的智库评价年度报告——《全球智库报告》也继承了这一研究视角和方法，以问卷调查的方式针对智库本身开展研究，并且项目启动至今积累的关于全球智库的丰富数据资源，也为开展智库的实证研究提供了素材。

在智库实践领域，麦甘通过每年发布《全球智库报告》与全球的主要智库、智库从业者、智库观察者、智库研究者建立联系。由于其研究方法主要采用整体印象评价法，依靠专家打分进行全球智库排名，麦甘每年都要与全球各地的智库专家进行联络，经过 10 余年的实践已经积累了丰富的专家资源，搭建了广泛的智库人脉网络。结合其报告中的相关数据来看，《2008 年全球智库报告》中提到全球愿意参与其评价排名的智库机构有 400 余家，发放了专家问卷的智库专家有 500 余人，其中包括智库学者、智库、基金会、非政府组织、政府间组织等机构的管理者，智库理事等。而发展到《2017 年全球智库报告》，其联系的智库机构已经达到 6500 余家，发放问卷的专家已经达到 7500 余人，包括来自全球各地的决策者、记者、公众和私人捐助者。如果该报告中所披露的这些数据属实，麦甘通过开展全球智库评价工作所积累的智库资源确实极为可观。并且，在《2017 年全球智库报告》中，麦甘表达了对分布在全球 75 个国家、100 多个

① James G. McGann,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Index Report* (1st-11th edition), Philadelphia: Think Tanks and Civil Societies Program,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2017, p.34.

② D. Stone and A. Denham, eds., *Think Tank Traditions: Policy Research and the Politics of Ideas*,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2-15.

③ 朱旭峰：《“思想库”研究：西方研究综述》，《国外社会科学》2007 年第 1 期。

④ James G. McGann, *The Competition for Dollars, Scholars and Influence in the Public Policy Research Industry*, Marylan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95.

城市、170多个组织机构的感谢,这些机构将负责《全球智库报告》在当地的发布工作。这些都体现出《全球智库报告》在全球智库评价领域的强大影响力。《全球智库报告》每年发布前后,在发布方的主动宣传和媒体的追踪报道之下,总是能够以排名吸引智库界和公众的眼球,这种高曝光率也相应地推升了编制智库排名报告的麦甘本人及其课题组的话语权和社会影响力。^①近年来有声音指出,以这170多个组织机构为代表的、与麦甘保持良好互动关系的智库会在排名中取得可观的位次,无论是否属实,10多年来积累的资源 and 影响力确实帮助麦甘获得了在全球智库体系中的话语权。

第二,为了协助美国进行良好的国际形象和外交关系的塑造。《全球智库报告》中无论是对全球智库发展趋势和热点话题的总结,还是每年根据全球格局发展变化而调整的榜单设项,都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美国在相关领域的态度和立场。

不可否认的是,在《全球智库报告》关注的全球性趋势或话题方面,十份年度报告的关注焦点都或多或少地反映出所在时点全球的发展变化趋势,尤其是全球化、创新、可持续发展等都是受到世界各国广泛关注的话题;但深入辨析便会发现该报告仍是从美国的视角出发在进行阐释,更多反映出的是美国眼中全球智库的发展变化情况,表达的是美国在相关问题上的立场。在针对智库的发展趋势以及面临的挑战进行探讨的过程中,当涉及权力分散、新兴发展中国家崛起、政治瘫痪、国家与超级个体、社会网络等角度的剖析时,都无法脱离美国的话语体系。同样,在不同时点上,对于金砖五国、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非洲资源危机等焦点的探讨,也主要是为美国站台,帮助美国塑造一个心怀全人类、引领世界发展趋势的大国领导者角色。

在《全球智库报告》的榜单设项和每年的变化方面,报告也同样体现出了美国本位的特点,社交媒体、国防安全、健康政策等大多属于美国的政策关注焦点。例如,在2008年第一份报告中,中国的智库数量为74,全球排名12位,亚洲排名第3位,仅次于印度和日本。^②但是在2008年报告开篇关于全球七大区域之一的亚洲智库中心的论述中,却没有提及印度和中国,取而代之的是澳大利亚(悉尼)和马来西亚(吉隆坡),但两者的排名都在中国之后。基于这一现象,我们认为《全球智库报告》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当时的外交立场。2008年,印尼总统苏西洛提出的“建立美国—印尼战略伙伴关系”的倡议得到了美方的积极回应,同年11月,两国元首正式签署了“全面伙伴关系”协定。^③与此同时,结合澳大利亚在全球的重要战略地位,报告中这样的设计确应是对美国外交立场的一定体现。而另一方面,针对《全球智库报告》的排名结果进行统计发现,除各国最主要的1—2家智库外,上榜智库的名称中大多带有international、overseas、world等与国际关系或全球问题相关的字眼,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全球智库报告》关注的智库大多以国际问题为主要研究领域。同样以中国为例,在连续多年上榜的中国智库中,除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外,还包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等。

① 朱旭峰:《智库评价排名体系:在争议中发展完善》,《光明日报》2016年2月3日,第16版。

② James G. McGann,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Index Report* (1st-11th edition), Philadelphia: Think Tanks and Civil Societies Program,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2008, pp. 9-14. 此外,我们观察到自2009年起中国智库的数量便跃升为全球第2位,且一直保持至今,结合中国的智库发展历程,2009年并非智库数量激增的时点,由此可以反映出2008年麦甘报告的统计有较大偏差。

③ 仇朝兵:《美国与印度尼西亚“全面伙伴关系”评析》,《美国研究》2015年第2期。

这类智库在影响一国的外交政策制定以及协助政府开展公共外交方面大多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在近两年入榜的国内社会智库也大多具有类似特点。

三、《全球智库报告》的方法与内容缺陷

尽管《全球智库报告》在世界各国的智库评价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但不可否认的是，它无论是在方法上还是在内容上都存在很多“硬伤”。

一是评价的方法过于主观。课题组邀请各领域的评价者开展主观评价，进行投票排名，然而这种评价方法一方面无法保证评价指标在评价过程中得到了多大程度上的参考，另一方面也无法判定评价者自身的专业背景、地域、职业等要素对评价结果的干扰程度有多大。

二是评价的专家结构过于模糊。纵观十年的《全球智库报告》，曾被提及的参与评价的专家团队包括智库负责人、智库普通工作者、决策者、各领域专家、记者、捐赠者、公民代表、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学术机构等。然而，报告并没有给出这些专家的专业领域、所在地区、职称学历等具体信息，同时“决策者”、“公民代表”等概念过于模糊和宽泛。

三是排名结果中存在较多自相矛盾的漏洞或者明显的错误，令人怀疑其专业性和严谨性。例如，智库名称错误，同一智库在同一个榜单内出现两次，同一智库在不同榜单中名称不一致等。^①

以《2017 年全球智库报告》为例，出现了包括遗漏意大利在内的明显错误。根据全球智库按国家分布情况表格中显示，意大利的智库总量为 103 家，与俄罗斯相等，应并列为全球第 9 位，但是在“全球拥有智库数量 TOP25”的榜单中，意大利并没有上榜。

此外，存疑之处还包括，《2016 年全球智库报告》中，澳大利亚拥有智库数量为 63 家，在“全球拥有智库数量 TOP25”榜单中名列第 16 位；但在《2017 年全球智库报告》中，澳大利亚的智库数量骤减至 39 家，且未上榜。与澳大利亚的情况形成对比，《2016 年全球智库报告》中，奥地利拥有智库数量为 40 家，未上榜；但在《2017 年全球智库报告》中，奥地利拥有智库数量增加至 68 家，在“全球拥有智库数量 TOP25”榜单中名列第 17 位。这一现象很容易让人怀疑，《全球智库报告》是否混淆了澳大利亚（Australia）和奥地利（Austria）两个国家的名字。

《全球智库报告》中关于中国智库的漏洞和错误也频频出现。例如，在《全球智库报告》中，中国智库总量在 2008 年第一版报告中位列全球第 12 位，但从 2009 年第二版开始便已经跃升为全球第 2 位，且一直保持在这一位置，具体数量也一直保持在 430 家上下，直到最新发布的《2017 年全球智库报告》中才增加到 512 家。这一具体数字是否准确我们暂不作判断，但很显然这十年间的《全球智库报告》并没有观测到中国智库发展变化的准确趋势。结合习近平总书记 2013 年 4 月“关于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批示和两办《意见》来看，2015 年 1 月正式拉开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序幕，可以说，中国智库进入飞速增长的时间节点应该出现在 2015 年，《全球智库报告》在这一点上显然出现了时间上的错位。针对《全球智库报告》中对于中国

① 参见荆林波：《从西方智库观念偏颇看如何建好中国智库——兼评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全球智库报告〉》，《党建》2016 年第 3 期；刘亮、吴笙：《不盲从麦甘“全球智库报告”》，《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 年 5 月 17 日，第 1 版；王斯敏、张胜：《世界智库评价需要“中国声音”——访“全球智库评价报告”课题主持人荆林波》，《光明日报》2015 年 11 月 25 日，第 15 版。

智库的覆盖、分类乃至排名，更存在着相当大的争议。另外，在 2010 年《全球智库报告》中还发生了在排名中重复出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并列等错误，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麦甘课题组对于中国的智库体系缺乏基本的了解。因此，至少在反映中国的智库发展方面，《全球智库报告》是否具有足够的公信力相当值得怀疑。

笔者汇总整理了《全球智库报告》（2008—2017）十年报告中“全球顶级智库”、“中国、印度、日本和韩国的顶级智库”、“国内经济政策领域的顶级智库”各榜单中的中国智库入榜情况，参见表 2—表 5。

表 2 《全球智库报告》（2008—2017）
全球顶级智库（非美国）主要智库榜单——中国智库入榜情况统计

报告年份	入榜智库总数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
2008	50	25	34	/	/	/	/	/
2009	50	15	34	/	/	/	/	/
2010	50	15	/	38	49	/	/	/
2011	50	14	/	42	/	/	/	/
2012	100	5	64	25	36	79	/	/
2013	100	9	64	28	30	79	/	/
2014	100	28	64	16	33	62	94	/
2015	137	27	68	16	34	65	92	/
2016	150	26	79	14	34	71	98	142
2017	142	23	91	9	/	53	116	98

注：列表机构顺序为该机构在该榜单中的上榜时间顺序。

数据来源：根据《全球智库报告》（2008—2017）进行汇总整理。

表 3 《全球智库报告》（2009—2017）
全球顶级智库（美国和非美国）主要智库榜单——中国智库入榜情况统计

报告年份	入榜智库总数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	团结香港基金
2009	25	/	/	/	/	/	/	/	/	/
2010	25	24	/	/	/	/	/	/	/	/
2011	30	28	/	/	/	/	/	/	/	/
2012	150	17	38	48	63	73	100	/	/	/
2013	150	20	36	44	61	71	99	/	/	/
2014	150	27	36	40	61	71	48	106	/	/
2015	175	31	35	39	64	72	50	149	110	/
2016	175	38	40	33	80	74	52	149	111	/
2017	173	39	50	30	79	94	58	/	92	173

注：列表机构顺序为该机构在该榜单中的上榜时间顺序；全球顶级智库（非美国/美国和非美国）榜单从《2009 年全球智库报告》开始发布；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自 2013 年更名为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

数据来源：根据《全球智库报告》（2009—2017）进行汇总整理。

表 4—1 《全球智库报告》（2008—2017）

中国、印度、日本和韩国的顶级智库榜单——中国智库上榜情况统计

报告年份	入榜智库 总数	中国社会 科学院	上海国际 问题研究院	中国现代 国际关系 研究院	中国国际 问题研究院	九鼎公共 事务研究所	香港经济 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 国际战略 研究院
2008	25	1	6	9	13	15	19	/
2009	40	2	8	5	14	24	6	/
2010	25	1	7	5	11	/	14	/
2011	30	1	8	6	/	27	/	19
2012	45	1	14	4	8	34	/	18
2013	45	4	14	8	3	34	/	17
2014	50	11	18	5	3	33	/	16
2015	65	10	15	4	8	36	/	23
2016	90	13	22	4	8	41	/	24
2017	90	12	23	4	8	40	/	25

表 4—2 《全球智库报告》（2008—2017）

中国、印度、日本和韩国的顶级智库榜单——中国智库上榜情况统计

报告年份	入榜智库 总数	国务院发展 研究中心	中国国际 经济交流中心	中国人民大 学重阳金融 研究院	上海社会 科学院	中国与 全球化智库	金融 40 人论坛	团结香港 基金
2008	25	/	/	/	/	/	/	/
2009	40	/	/	/	/	/	/	/
2010	25	/	/	/	/	/	/	/
2011	30	/	/	/	/	/	/	/
2012	45	19	/	/	/	/	/	/
2013	45	19	/	/	/	/	/	/
2014	50	13	42	44	45	47	49	/
2015	65	13	47	40	39	34	51	/
2016	90	10	45	51	35	30	48	60
2017	90	10	44	54	34	22	47	53

注：自 2012 年起改为“中国、印度、日本和韩国的顶级智库”榜单，列表机构顺序为该机构在该榜单中的上榜时间顺序；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自 2013 年更名为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从《2008 年全球智库报告》开始出现在报告中。

数据来源：根据《全球智库报告》（2008—2017）进行汇总整理。

表 5 《全球智库报告》（2008—2017）国内经济政策领域的顶级智库榜单——中国智库上榜情况统计

报告年份	入榜智库 总数	中国社会 科学院 世界经济 与政治 研究所	香港经济 研究中心	九鼎 公共事务 研究所	国务院 发展研究 中心	中国人民 大学 重阳金融 研究院	中国社会 科学院	上海社会 科学院	国家 发改委 宏观经济 研究院	团结 香港基金
2008	10	/	/	/	/	/	/	/	/	/
2009	10	/	/	/	/	/	/	/	/	/
2010	25	/	/	/	/	/	/	/	/	/
2011	30	30	/	/	/	/	/	/	/	/

续表 5

报告 年份	入榜智库 总数	中国社会 科学院 世界经济 与政治 研究所	香港经济 研究中心	九鼎 公共事务 研究所	国务院 发展研究 中心	中国人民 大学 重阳金融 研究院	中国社会 科学院	上海社会 科学院	国家 发改委 宏观经济 研究院	团结 香港基金
2012	80	11	35	40	75	/	/	/	/	/
2013	80	12	35	38	75	/	/	/	/	/
2014	80	41	/	37	34	48	/	/	/	/
2015	133	41	/	36	34	48	98	117	131	/
2016	135	41	/	36	34	53	89	119	133	/
2017	140	43	/	38	36	60	90	122	139	133

注：列表机构顺序为该机构在该榜单中的上榜时间顺序；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从《2008 年全球智库报告》开始出现在报告中。

数据来源：根据《全球智库报告》（2008—2017）进行汇总整理。

结 语

尽管《全球智库报告》在智库评价领域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但从本文的分析可以看到，其智库排名在科学性上远非无懈可击，甚至与通常意义上国际领先研究的学术标准也有相当距离。与此同时，《全球智库报告》无论是主题选取还是评价标准都基于其特定的价值语境，并且带有很强的预设立场。因此，《全球智库报告》对于我们的意义更多应是在方法上的借鉴而不是其具体排名。实际上，《全球智库报告》的中国智库排名不仅不适合作为我国智库建设与评价的参照标准，而且具有相当的误导性。反过来，在国内智库领域关于《全球智库报告》存在的一些模糊认识也提醒了我们，基于自身国情和发展目标，建立具有公信力的国内智库评价体系的重要性。

面对《全球智库报告》，国内智库界应当保持充分的理性，辩证认识，客观解读，不过度盲从，也不过度否认。根据近年的持续跟踪观测，我们发现国内媒体针对《全球智库报告》的报道渠道更多集中在网络平台，且近年更多趋于对国内合作发布机构的新闻通稿的转发；与此同时，国内智库界对该报告的解读和评价也更加理性和客观，为社会提供了更多不同的声音，这是一个很好的趋势。我们希望以《全球智库报告》为鉴，在中国智库研究乃至更为广泛的学术建设中，对于国外的评价与意见都能够持有更为自信和冷静的态度，从而也使得国际学术话语交流更加公正和有效。

〔责任编辑：俞武松〕